

许国霖与敦煌遗书资料汇编工作

林世田

国家图书馆是世界上收藏敦煌遗书的四大藏家之一，也是中国早期敦煌学研究的重镇之一。1910年京师图书馆成立不久，学部即将解京的敦煌遗书移交入藏，可以说对其整理与研究的历史贯穿整个图书馆发展的历史。通过敦煌遗书的整理与研究，在馆内外集聚了许多敦煌学专家，他们爬疏整理、钩沉搜佚，贡献了许多不朽的学术著作。许国霖先生就是其中的一员。在国家图书馆百年馆庆即将到来之际，利用编写馆史之机，在余欣先生研究¹的基础上，删繁提要，草成此文，以祝百年馆庆。

许国霖字雨新，湖南湘阴人，北平平民大学毕业，曾任国史编纂处征料员、湘阴县乡村教育筹办委员会委员。1929年10月应聘入馆，从写经组筹建成立，直至敦煌遗书装箱南运，一直在写经组任职。1935年6月写经组组长胡鸣盛辞职时，将敦煌遗书及目录交其代管，可见他当时深获赏识。

许国霖在为敦煌遗书编目时，认识道：“馆藏者，虽为劫后之余，而可珍之处，犹足多矣。溯自发现以来，迄今已三十年，伦敦、巴黎所藏，或影印辑录，或传抄刊布，流行于世者甚夥，治学之士，孳孳研究，于典章学术咸有发明。而吾国所藏，以编目未竣，未能公之于世，宝韞珠藏，良可惜也。”²于是在“公余之暇，则行逸录”，相继发表了《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等三部敦煌学重要著作，使其在敦煌学学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敦煌石室写经题记》发表在1935年11月《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九卷第六号上，共收写经400余号，有年代可稽者40余例，上起北魏太安，下迄宋太平兴国。题名1200余号。此中仕宦僧尼写经之人，均有关历史之考证。

1937年6月，许国霖把辑录的《敦煌杂录》与发表在馆刊上的《敦煌石室写经题记》合刊，题为《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交由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出版。首次刊布的《敦煌杂录》，共录文80余篇，就其性质可分为变文、偈赞、音韵、文疏、契约、传记、目录、杂类等八类，“以唐代民间通俗之作为多，可以考谣谚之源流，窥俗尚之迁易，欲知

林世田，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

¹ 余欣：《许国霖与敦煌学》，《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七卷，中华书局，2004年1月。

² 许国霖：《〈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序》，《敦煌丛刊初集·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6月。

千年来社会之演进，及经济之转变者，此是重要之史料也。”³胡适先生在序言中评价说：“‘敦煌写经题记’共收四百多条，是一组最有趣味又最有历史价值的材料。伯希和先生曾对我说，他在敦煌挑选这些写本，曾定出几个标准：第一挑有外国文字的卷子，第二挑释藏以外的材料，第三平常佛经只挑那些有题记可供考订的卷子。北平所藏，是伯希和挑剩的卷子，居然还有这四百多条题记可录，这是出于我们意料之外的喜事。将来若有人能将巴黎伦敦以及私家所藏的敦煌卷子的题记全部记录出来，成为一部《敦煌写本题记全集》⁴，一定有不少的重要材料或问题，可以供史家的研究。”“‘敦煌杂录’是继续蒋斧、罗振玉、罗福葆、刘复、羽田亨诸先生的工作，专抄敦煌石室所藏非佛教经典的文件。蒋氏之书最早（宣统元年），三十年来，这类佛经以外的敦煌文件陆续出现，最大的一批是刘复先生从巴黎钞回来的《敦煌掇琐》。但这些都是国外的敦煌文件。北平所藏的经典以外的文件，除了向达先生钞出的几件长卷之外，差不多全没有发表。所以外间的学者只知道北平所藏尽是佛经，而不知道这里面还有这许多绝可宝贵的非教典的史料！”⁵

《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是《敦煌劫余录》的补苴工作之一，吴其昱先生也说：“至于目录方面，1931 年陈垣《敦煌劫余录》共著录 8679 号（中有缺号，实约 8221 轴）稍嫌简略，过重经典；卷背文字常为极重要之文献，幸许国霖略有抄录。”⁶

许国霖在《敦煌石室写经题记》的基础上，又将罗振玉《永丰乡人杂著》、翟林奈《斯坦因收集品中的汉文纪年写本》（L. Giles: Dated Chinese Manuscripts in the Stein Collection. I,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vol. 7: 4, II, vol. 8: 1.）、矢吹庆辉的《鸣沙余韵》、李盛铎旧藏照片、王重民所摄法藏敦煌文献照片、罗振玉旧藏照片 7 中题记抄出，重加编订，题为《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其有年代可稽者，计二百余则，上起西晋元康，下迄宋太平兴国，且有当年仕宦僧俗写经人名颇多，悉足以资历史之研究。⁷自 1936 年 11 月，许国霖在《微妙声》月刊上相继刊发《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敦煌石室写经年代表》和《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补遗》。1937 年 6 月许国霖将上述文章合成一书，以《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为题，作为菩提学会编辑的

³ 许国霖：《〈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序》，《敦煌丛刊初集·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年 6 月。

⁴ 1990 年日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出版的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一书，将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写本文献中的跋文题记汇编起来，共 2623 条，按时代录文，是敦煌写本题记资料的集大成著作。

⁵ 胡适：《〈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序》，《敦煌丛刊初集·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年 6 月。

⁶ 吴其昱：《八十年来之敦煌学》，《汉学研究通讯》第五卷第四期，1986 年 12 月，第 162 页。

⁷ 李盛铎旧藏照片、王重民所摄法藏敦煌文献照片、罗振玉旧藏照片系余欣在《许国霖与敦煌学》中考证出者，见余欣：《许国霖与敦煌学》，《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七卷，中华书局，2004 年 1 月，第 84 页。

《微妙声丛刊》之一，由佛学书局印行。本书共著录佛经 157 种，题记 645 则（其中 11 则非敦煌所出），每则题记后均标明编号，若是转录者则注明出处。这在当时是最为丰富的集录。陈寅恪曾于 1937 年 7 月应许国霖之请，为之撰序，可能由于错过出版时间，是序未能与书同时刊印，陈寅恪序言另行发表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第八本第一分（1939 年 10 月）上。

江素云所编《维摩诘所说经敦煌写本综合目录》列为《东初智慧丛刊》第二十二种，1991 年由台北东初出版社出版，学者称便。查馆史资料，许国霖在 1932 年之前就曾编写了《佛说无量佛经索引》、《维摩诘所说经索引》、《大般涅槃经索引》、《佛说阿弥陀经索引》、《大方广佛华严经索引》、《佛说药师经索引》等七种写经目录索引⁸，惜未能面世，书稿亦不知下落。

许国霖虽然一生的所有学术工作只是资料整理，从未写过任何研究著作，但是他的劳绩，推动了北京图书馆藏敦煌写本的利用，向学术界传播了国内外最新的学术信息，对于三四十年代，乃至至今的敦煌学研究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功不可没⁹。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立北平图书馆群星闪耀，人才济济，成为当时著名的学术研究机构、人才培养基地，馆里拥有有一大批学养丰沛的青年学者，他们从事编目、索引、编资料、整理图书、撰写书评等工作，他们把图书馆业务工作与研究结合起来，从工作中得到培养提高，很多人以后都成为卓有建树的大家，如：王重民、向达、贺昌群、谢国桢、刘节、赵万里、谭其骧、孙楷第、于道泉、张秀民等。而更多的青年才俊则如许国霖先生一样，一辈子默默无闻，名不见经传，然而他们扎扎实实的工作推动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促进了学术研究的进步。

⁸ 国立北平图书馆编：《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民国二十年七月至二十一年六月），北平，国立北平图书馆，1932 年。

⁹ 余欣：《许国霖与敦煌学》，《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七卷，中华书局，2004 年 1 月，第 84 页。